

五四前期周作人新理想主义观研究

张先飞*

目次

- 引言 新理想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思潮
- 周作人 新理想主义观
 - 1、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观念及其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 2、周作人 新理想主义精神本质的理论思考
 - 3、周作人与新理想主义世界改造思潮

引言 新理想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思潮

本文所论及的新理想主义¹⁾，是指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理论家对当时出现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对自然主义时代精神进行反拨的一种思潮倾向的总体概括，其指涉范围相当广泛，各领域内的所指也有较大差异，但同时，在不同领域中新理想主义思潮活动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彼此相互影响渗透。在现有各种史论叙述中，新理想主义主要被概括为两方面的思潮流向，其一是哲学的思潮动向，其二是一种文学

* 中国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cxianfei@gmail.com

1) 新理想主义的提法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曾出现很多，但所指不大相同，如1916年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8月22日《晨钟》报)中说的尼采的新理想主义明显是指鲁迅所谓的“新思潮之至新者”，与本文所论及的新理想主义没有太多关系。日本还有以此命名的大型刊物，即茅原华山主编的《第三帝国》月刊，1913年创刊，不二出版，其英文刊名为THE THIRD EMPIRE The First Symbolization of Neo-idealism in Japan，其中虽然也涉及到本文所论及的哲学的新理想主义观念，但刊物中多数所谓新理想主义，是指建设新的理想的日本，建立起新的人生、社会、思想，与本文所论及的新理想主义几乎没有关系。

艺术思潮及社会思潮，对于前者，大江精志郎在1936年出版的《世界文艺大辞典》中作了较全面的概括：

与自然科学的极盛相伴随，在哲学思想上自然主义与唯物论从19世纪中叶起便居于支配地位，作为对此的反动，始于19世纪末，在德国与“回到康德”的呼吁同时，新康德派与柏格森、倭铿等的理想主义的哲学勃兴起来。这些认识论上趋向观念论、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上趋向唯心论的诸种哲学动向统称为新理想主义²⁾。

当然从广义而言，新费希特学派 (以倭铿³⁾为代表)、新黑格尔学派 (以克罗齐为代表)、现象学、生命哲学都可以包含在内。⁴⁾ 本文将着重讨论作为文学艺术思潮及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它与作为哲学思潮的新理想主义有一定距离。⁵⁾

- 2) (日) 吉江乔松主编，《世界文艺大辞典》(『世界文艺大辞典』) 第四卷，中央公论社，1936年11月，P215页。此处引文为论者所译，以下皆同。
- 3) 德国哲学家奥伊肯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20世纪1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多种译名，如倭铿、倭伊铿、倭伊鉴、倭俟铿、郁根、欧根等。
- 4) 广义的定义，参见《广辞苑》(『广辞苑』)“新理想主义”辞条 (新村出编，岩波书店，1955年5月初版，P1128页)、《大辞林》“新理想主义”辞条 (松村明、三省堂编修所编，三省堂，1988年，P1255页)。较为狭义的定义，其一是专指德国新康德学派，参见《教育大辞书》“新理想主义”辞条 (商务印书馆，1928年，P1278-1279页)；西田几多郎的《现代理想主义的哲学》(『现代に於ける理想主義の哲学』) (弘道馆，1917年)，朝永三十郎的《近世“我”之自觉史—新理想主义哲学及其背景》(『近世に於ける「我」の自觉史—新理想主義と其背景』) (东京宝文馆，1916年1月，蒋方震译为中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月) 两部专著对此也都进行了细致研究。其二是专指倭铿的哲学思想，因为倭铿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想主义，参看《新思想的解剖·上》(『新思想の解剖』)的“新理想主义”辞条 (高木八太郎著，教文社，1922年2月，P261-265页)。在1911年和1913年的日本至少有两部直接标名为新理想主义的译著，一部是倭铿1909年所作演讲《自然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自然主義か理想主義か』) (鹿子木员信译，《新人》，1911年9、10月)，其中译者还谈到西方人对倭铿思想的推重程度，1911年他在德国耶拿留学时，一个英国人和他同时翻译这部书；另一部，原名《为精神的生活内容而战》，被直接译为《新理想主义的哲学》(『新理想主義の哲学』)，倭铿亲自作序 (波多也精一、宫本和吉共译，东京内田老鹤圃刊行，1913年)。
- 5) 关于两种类型的新理想主义的划分，亦可参照谢六逸所著《西洋小说发达史 (七)》，载1922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两种类型的新理想主义虽有一定联系，但绝非如沈雁冰在《中国文学变迁史·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上海新文化书社，1921年版) 等中所说的那样，是哲学思想决定文学的关系。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新理想主义的思想潮流也在中国得以介绍、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既有来自于日本的转介⁶⁾,也有直接引自于西方的。1902-1904年王国维阅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的《哲学导论》与《伦理学体系》(王国维的译名为《哲学概论》、《伦理学系统》),并受其影响。《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及第二篇经蔡元培据日译本译出,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由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⁷⁾。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10卷1号上发表〈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介绍柏格森和倭铿的哲学观,并在1917年6月编译出版《德国大哲学家郁根传》(商务印书馆)。而最早明确论及新理想主义观念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做了名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在介绍日本文学的最近趋向时,谈及作为文学思潮的新理想主义的流行情况⁸⁾,此外,9月29日杭州《教育周报》216期刊载了去非译自日本介绍新理想主义哲学的〈郁根之新理想主义〉一文⁹⁾。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内形成了介绍西学的热潮,东方文化论亦悄然兴起,还出现了“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这样两次大的论战。正是在这些活动中,新理想主义得到了广泛介绍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对于哲学的新理想主义的介绍,哲学思想界出现了大量译述、译著、专论,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统计,截至30年代中期,专门译著、以及论及这一问题的相关著作,已不少于四十余种¹⁰⁾。这其中,重要的介绍者有李石岑、张君

6) 19世纪后期以来,新理想主义不仅在欧美各国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即使在后起的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正初期(1912年前后),移植德国的新理想主义哲学成为一时的风潮[金子筑水,〈明治时代的哲学及伦理〉(『明治時代の哲学及伦理』),《解放》(『解放』),1921年10月,《明治文化研究号》(『明治文化の研究号』)],作为哲学观念的新理想主义盛极一时,较为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介绍新康德学派为主的西田几多郎的《现代理想主义的哲学》与朝永三十郎的《近世“我”之自觉史—新理想主义哲学及其背景》等,此外,柏格森、倭铿也得到广泛译介。同时,白桦派在反自然主义潮流中也掀起了新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文艺运动及社会改造运动。日本当时的这些译介成果与理论创造,在中国被广泛借鉴。

7) 罗钢,〈王国维与泡尔生〉,《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4月17日作,1918年4月19日讲演,连载于1918年5月20日到6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141-152号。

9) 1916年1月15日至1917年6月20日《教育杂志》8卷1号至9卷6号中曾经多期连载了美国Herman Horrell Horne所著〈新理想主义之教育〉一文,过瑶圃译,不过与本文所论及的新理想主义没有多大关系。

10)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功、朱谦之、张东荪等，李石岑借助《民铎》杂志，介绍最力，并广有译介、撰述¹¹⁾，张君勱是倭铿的最重要的介绍者与杜里舒的主要译者，他利用《改造》、《解放与改造》等刊物大力宣传新理想主义与倭铿的哲学，朱谦之着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介绍新理想主义，张东荪是介绍柏格森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国人还在20年代前后与西方新理想主义哲学家进行了直接交流，如1919年梁启超、张君勱等于欧战后西游，在法德与柏格森、倭铿会晤，张君勱之后游学欧洲，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1921年共学社还欲邀柏格森、倭铿讲学，倭铿推荐了杜里舒于1922年来华讲学。这一系列活动对于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柏格森、倭铿等的观念成为“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哲学的新理想主义观推动了五四以来生命哲学的发展。哲学思想界对新理想主义观的介绍与运用，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所反映，比如在政治思想界，李大钊提出以新理想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¹²⁾，还出现了李达、张君勱等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派的康德化”问题的争论¹³⁾。

相形之下，对于作为文艺思潮、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的介绍，在1920年以前，除了周作人外，在中国文坛及思想界几乎渺无声迹，直到1920年之后，这一理论解释系统才开始在一些译著与著述当中出现，但明确肯定这一说法，并使用这一解释系统的，当时也只有周作人、沈雁冰、谢六逸、郁达夫、张闻天、汪馥泉、郑振铎等，到了1923年后的“苦闷时期”，它才被广泛地接受，在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的文学史、文学思潮史的编著、翻译热潮中，出现了大批使用这一解释系统的译著、编译、论著。当时被较多翻译的是日本的宫岛新三郎、相马御风、升曙梦几位文学史家的著作，沈雁冰、谢六逸、孙席珍、汪馥泉、吴云、黄忏华等是重要的介绍、翻译、编著者¹⁴⁾。不过，这一

11) 李石岑从1919年起就开始介绍哲学的新理想主义，并有多种译、著，对于五四时期人生哲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他的介绍存在问题，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直接搬用国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是日本学者），甚至全文移植，却不标注出来源。

12)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1919年5月6卷5号。对李大钊新理想主义观的辨析，是李大钊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最常见的观点，是将他所说的新理想主义看作“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或者等同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协合互助思想。在论者看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仅仅语焉不详地提及了新理想主义，从前后文很难看出其确切含义，而且在《史学要论》中他也是谈到西南学派的历史观，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关，因此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新理想主义的提法实际难以考证辨析其确切含义。

13) 参看张君勱所著《精神生活的改造》，《解放与改造》1920年4月2卷7号；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1921年1月8卷5号。

14) 重要译著包括：(日)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张我军译，开明书店刊行，1930年7

解释系统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系统的冲击下，很快便失去了影响力。

本文中探讨作为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的新理想主义在中国的思潮表现。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本特质简单概括就是：基于对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实证科学至上的时代的观念的反动，表现出积极肯定人生的态度，同时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并抱定坚定的理想，不仅发出社会改造的强烈吁求，而且直接投入到积极的社会改造实践中。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本观念在中国虽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真正形成一种思潮现象的时间却较为短暂，主要集中于五四前期的社会改造热潮当中，当时的社会运动、文学活动充分显现出了新理想主义的某些基本特质。周作人是这一思想浪潮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理论的介绍与思考，并特别强调新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实践的关系。一般认为，周作人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活动家，不过实际上当时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正是新理想主义思想潮流中最为重要的一支¹⁵⁾。

应该说，周作人引入新理想主义思潮，是有着明确意图的，而且他对于新理想主义观念有着整体的判断与独立的思考，分析也较为全面透彻。论者拟就周作人对于新理想主义思潮倾向的认识进行阐发。不过由于他的论述过于简短，只是在文章中片断出现，或是在其所译作品的附记中精要论及，因此论者就需要参照五四前后至30年代各种文学史、思潮史译、著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他的新理想主义观念。

I. 周作人的新理想主义观

如前所述，国内最早论及作为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是在1918年4月

月初版；《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瞿然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4月出版。（日）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北新书局发行，1931年7月初版。（日）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汪馥泉译，1930年10月初版，上海中华书局。着重论及新理想主义的论著主要有：孙席珍，《近代文艺思潮》，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局，1929年9月出版；吴云，《近代文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黄忏华编述，《近代文学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9月初版等。

15) 参照以下所列著作。重要译著包括：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着重论及新理想主义的论著主要有：孙席珍，《近代文艺思潮》；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吴云，《近代文学ABC》；黄忏华编述，《近代文学思潮》。

19日周作人的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当中，周作人把不久之前发生的对自然主义的反动的倾向概括为新主观主义：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

接着他把新主观主义分为“享乐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对于“理想主义”，周作人作了如下解说：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柏格林创造的进化说，罗兰的至勇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勃克莱与惠特曼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913），势力渐胜，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淳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¹⁶⁾

这里周作人虽然只是在介绍当时日本的一种思潮现象，但从他的客观描述中，明显可以看到日本“理想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欧西新理想主义思潮间的密切关系，而通过这一时期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我们更能清楚地了解到，他把理想主义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正在广泛流行的一种思潮现象。自1919年到1920年间周作人在他的小说翻译的译者附记中曾多次论及现代西方的思潮现象，就“理想主义”，他分别在〈沙漠间的三个梦〉（南非作家Oliver Schreiner）、〈诱惑〉、〈黄昏〉（波兰什朗斯奇），〈晚间的来客〉（俄国库普林）、〈玛加尔的梦〉（俄国柯罗连珂）的译者附记中论及，或分析了其具体的精神实质¹⁷⁾，比如“现代文人对于人生，又多带乐观的倾向，在文艺上。理想主义渐占了势

16)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17) 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1919年4月12日作，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诱惑〉〈黄昏〉译者附记〉，1919年12月20日作，1920年2月1日《新青年》7卷3号；

力”¹⁸)、“(诱惑)的作者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家”¹⁹)、“(库普林……最有名的《生活的河》与《泥沼》等几篇,写实里面,也都含有新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可说是他的特色所在”²⁰)、“(玛加尔的梦)——论者注)是写实主义后的理想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品”²¹)。而他在《玛加尔的梦》、《沙漠间的三个梦》的译者附记中则对“理想主义”的精神实质作了精要分析。对周作人而言,这些“理想主义”或“新理想主义”的提法实际上有专门的所指,它们同所谓“自然主义”、“新主观主义”、“新浪漫主义”一样,都是由当时西方批评家、文学史家对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并先后风行一时的文学活动、社会观念的思潮定位,在他们看来,这些思潮演进的过程是:由反对自然主义而出现了新浪漫主义与新理想主义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潮运动,两者被统称为新主观主义。²²)而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

《《晚间的来客》译者附记》, 1920年2月29日作,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7卷5号; 《《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 1920年8月27日作, 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8卷2号。

18) 周作人, 《《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

19) 周作人, 《《诱惑》(黄昏)译者附记》。

20) 周作人, 《《晚间的来客》译者附记》。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中也谈到, “库普林 (Kuprin) 以写实著名, 却也并重理想, 他的重要著作如《生命的河》及《决斗》等都是这样”, 此文为1920年11月8日所作讲演, 载1920年11月15-16日《晨报·副刊》。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中也是这样介绍的, “《生命之河》与《泥沼》则于写实主义里含着新理想主义”, 不过从介绍的全文来看, 完全是照搬自周作人的解释, 见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五》, 第十三章《迦尔洵与其它》, 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14卷9号。关于库普林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涵, 另外可参照沈雁冰(茅盾)著《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古卜林 (A. Kuprin))》中对于《生活的河》的分析, 载1921年9月《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21) 周作人, 《《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

22) 周作人的认识基本是当时的通行观点, 但因后人不能, 只看到茅盾多次谈到新理想主义, 于是新理想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便主要成为茅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但茅盾的看法与当时的通行观点不大相同。茅盾所使用的“新理想主义”概念, 其所指较为混杂, 在他的概念系统内, 他经常把“新理想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 如果依照通行的概念来衡量的话, 茅盾实际上是把属于新理想主义的思潮流向全都归到了新浪漫主义名下, 即把新主观主义的内容全部由“新浪漫主义”来涵括, 这与周作人的概念定位差别很大。不过在很少的情况下, 茅盾对新浪漫主义(他称作新传奇主义)的定义又完全与通行的说法一致(如《茅盾全集》31卷《外国文论三集》中《文艺小辞典》的《新传奇主义 (Neo-romanticism)》辞条, 1930年撰)。虽说茅盾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地理解、使用新理想主义概念, 但他对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及社会思潮现象作了大量的译介工作, 如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及社会思潮的译介等(包括“一战”前后的反战文学及思潮), 这些工作在当时十分突出。另外, 在论者看来, 在很多情况下, 茅盾在讲新理想主义时主要在说明一种社会思潮倾向, 讲新浪漫主义时更多是在说明文艺思潮的演变与特质。以上请参照《茅盾全集》29-33卷《外国文论》一一五集, 2001年第1版; 18卷《中国文论一集》, 1989年第1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小说之发达)中所提及的正在发生的理想主义思潮流向,在日本正是被视为整个世界思潮运动中一支,与所谓的“享乐主义”思潮倾向,分属新理想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在日本文坛、思想界的表现与实践²³⁾。应该说,这种认识在20世纪10年代前后至30年代,在西方、日本、中国的文坛、思想界成为一种常识之谈。

在周作人的这些言论中,不仅论及了这些思潮现象作为文艺思潮的一面,而且对于它们作为社会思潮的层面亦有所涉及。实际上,这些思潮现象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的,文艺中的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等不过是这些社会思潮的一种直接反映与集中表达而已。作为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等思潮,其观念倾向首先根本体现于全社会人生观念的整体取向上,因此思潮的演进过程也就最明显地显现在不同时期人生观念的嬗变当中。就新理想主义而言,它的出现主要缘于对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人生观念的反思,尤其是对其负面效应的强烈反拨。因此,欲清晰阐释新理想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的思考,首先必须回顾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的思潮特点及其对时代人生观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由此推断这种观念必然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1、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观念及其对人生观的负面影响

首先需要说明,周作人对于自然主义观念对人生观影响问题的论述较为分散,也不大系统,以下将结合30年代一些思潮史译、著中的论述加以分析。

在《近代欧洲文学史》²⁴⁾中周作人专章讨论了写实主义时代的文学,他从新理想主义者的视野出发,对自然主义的基本情况做出了客观描述。他将这一时代总体精神产生的基础,归之于近代自然科学与科学精神,他指出“Auguste Comte创实证说以来……研求真理者,多而自然科学为本”,“逮进化之说发明,科学思想、弥漫世界”。而自然派文学则是“根于时代精神”的自然产物,即“科学精神,及于艺文,入为本底”,产生了“唯物

23) 这是当时日本文学批评、史论的普遍看法,延续至现在的很多文学史、文学思潮著作当中。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始也曾谈及,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

24) 周作人编著的《近代欧洲文学史》(1917-1919年编著,止庵、戴大洪校注,团结出版社,2007年7月1版),在某些地方仍有编纂的痕迹,还出现了一些与他的观念不大符合的判断。本文多次引用的《绪论》与第五章《写实主义时代》,由于很多论点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印证,而且也没有出现相抵触的地方,大致可以代表了他同时期的思想观念或倾向。

思想之文学，即所谓自然主义”。科学思想也决定了自然派的基本特质，他简要概括为，首先自然派“重客观”，“描写事物，俱依实在。不以一己情思，有所损益”，其次自然派“尚真”，“凡人世所有事，继极凶戾丑恶，倘能观察精审，描写确实，俱可入文。盖文艺者，实为人生纪录……但能写现世裸露之真者，即为最善”，其三，自然派“好平凡”，“专写现世实事……所记者但为凡人庸行……故自然派著作，又有Uninteresting之称。而价值亦正在此”。²⁵⁾关于科学思想如何决定了这些基本特质，周作人归之于自然派的“求诚”的人生观念，他在小说《不自然淘汰》（瑞典斯忒林培格，现通译斯特林堡—论者注）的译者附记中指出，自然派的作家“以求诚为归”，而“求诚”的另一面正是描写人生的真实，因此不仅“所有自白，皆抒写本心，毫不粉饰”，而且“对于世间，揭发隐伏，亦无讳忌”²⁶⁾。

从他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中的作家分析，以及五四时期宣传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批判传统中国文学及黑幕小说等活动来看，他对于自然主义这些源于科学精神的特质的积极意义，是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的，不过未加系统论述。对这种积极意义日本文艺评论家宫岛新三郎（1894-1934）在1921年前后有相当简洁明晰的论述：

自然主义的最后终局的目的，是描写人生的真。从而什么东西，都可以为文艺之题材……如欲表现人生之真，便须将那丑恶的部分，黑暗的事实，不正的行为，一切都写出来。自然主义，在这种意思，是衡量广大的人生，深刻的现实的尺度。

赤裸裸的人，那种人和人的关系，集那种人于一处的社会的生活：这在自然主义的文学是唯一的题材，内容。一样是美人，打扮而盛装的美人，是浪漫主义者所好选的材料，反之，自然派作家，非把那打扮撤消，盛装卸掉，再把人的皮肤剥起来，用解剖刀将肚肠都剖给人家看不能了事。那里没有像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所梦想着似的，被薄霭蔽住的美之类。反而是丑恶其物，黑暗其物，兽性其物的揭扬，暴露。这种主张，旋又引出了广而深地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倾向了。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人生的关系，到此始加了所谓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度，而提高了文学之“社会的”价值。

追求人生之真这种倾向，不止于发见丑恶，暴露黑暗，剔抉兽性，还得进而对于深

25)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4，211、212页。

26) 周作人，《〈不自然淘汰〉译者附记》，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这一论断也出现于《近代欧洲文学史》，308页。

入于那根底的人性之弱点，对于欲一时糊涂那弱点的既成的宗教，道德，教育及其他偶像，振起破坏的大刀阔斧了。旧物破坏，偶像破坏的精神之所以为自然主义之有力的主张者，无非都是为此。社会问题，个人之解放，旧道德之破坏，既成宗教之否定等等之所以自然而然成了文学的内容者，也不足为奇了。

既然是要描写人生之真，那所谓人生之真，又较多出现于丑的，肉的，暗的方面，故自然派作家之好取题材于那方面，是毫不足奇的。²⁷⁾

从描写人生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最终目的出发，宫岛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作了较全面概括，实际上自然主义文学家们的这些主张正是这一时代的共同理念，可以说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激进思想家们共同完成了时代精神的构建，他们使这一时代的人生观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促使人们生成了偶像破坏、科学、求真等积极的人生观念。对此，周作人也曾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谈到，“许多重大问题，经了近代的科学的大洗礼，理论上都能得到解决。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²⁸⁾”。

但推崇求真、破坏偶像的自然主义，在用科学眼光认识整个世界、破除一切旧的思想观念的迷障时，显露出了明显的偏颇，而当它的一些观念被进一步推向极端时，它对于人们的精神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便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巨大负面影响，后果相当严重，新理想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反动，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这一点。

从新理想主义批判的眼光来看，自然主义对于时代观念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由科学化的态度形成的一些主要观念倾向，其二是自然主义者们

27) 这段译文见于张我军所译，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第二章《自然主义之意义和价值》中，1930年7月初版，开明书店刊行，P7-9页。宫岛新三郎做出这段分析是在1921年前后的系列演讲中，此演讲自1922年3月起，在《文章俱乐部》（『文章俱乐部』）连载达一年左右，在1924年以《明治文学十二讲》（『明治文学十二讲』）题名，由大洋社出版，这段分析见于第十讲《自然主义的意义及分化》（『自然主义的意义及分化』）第一节《自然主义文艺的内容》（『自然主义文艺の内容』）。

28)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北平少年中国学会讲演，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可以说，这些都是五四时期的普遍认识，如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年11月15日《新青年》1卷3号）中也做过相关论述：“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

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这些对于当时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基于科学化的态度，自然主义者形成了“无解决”、“无主张”，以及否定理想性精神诉求的观念倾向。

首先，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坚持一种“无解决”、“无主张”的态度。对此周作人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有所论及，“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²⁹⁾。在1921年群益书社增补重版的《域外小说集》的《著者事略》中，在评论莫泊桑时他也谈到，“摩波商……为法国自然派大家……在《彼得与约翰》自序中言、别无主张、唯以模写自然为务、盖深得自然派之实验科学法者”³⁰⁾，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他还引述了托尔斯泰《莫泊桑论》中对莫泊桑的评论，“彼盖绝不解释人生意义，对于世相，无所动心，亦别无好恶之念，人生之现状而已”³¹⁾。对这一问题日本文艺评论家升曙梦（1878-1958）有着更详细完备的论述，他说，由于自然主义“是从科学精神产生的，所以自然主义作品底最大特色……是在于科学的这一点。在自然主义，文学是科学化了的”，那么自然主义必然会要求客观冷静、无关心的态度，即所谓科学的，便是客观的，抛去了主观的冷静的客观的态度，既已取了冷静的客观的态度，作者自竭力地不显现那小的自我。有所谓自然底无关心，自然是无关心的，自然单由于因果的法则而支配一切，恶人也许光荣，善人也许苦恼，对于这些事是不理会的。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以和这不理会的无关心的自然一样的态度，来应付一切事象”，所以自然派作家对他们所观察与描写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人生黑暗面的态度就只能“是”，“不论怎样可愁可愤的事，只是冷静地观察和描写，决不悲哀愤怒，或叹息、憎恨、咏叹。单单照所能观察的观察，所能描写的描写，作家底工作已完事了，所以这里是把观察的描写的抛出就是了，决不叙述作家底意见、加以作家底解决的。就是让它无解决那么地放着，这是自然主义底特色”。不过他们的“无解决”态度并不是对社会、人生的冷漠无情、麻木不仁，这是科学的态度使然，升曙梦说“实际上，忠实地观察这现实底相

29)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30) 周作人、鲁迅，《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莫泊桑的《月夜》是由周作人翻译，因此莫泊桑的著者事略应为他所做，见《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初版。这一说法未见于1909年初版的《域外小说集》的《杂识》中。

31)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219页。

时，纷乱得很；可决不加解决”，即自然主义者特别强调现实世界过于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全部，另外人间、社会自有它自身的规律支配，因此人们对于眼前的事实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任何解决，如果“强加解决，这便成了独断……有伤科学的态度”。³²⁾

其次，缘于“科学化”的态度，自然主义者直接否定了理想的真实性及存在意义。我们说，如果自然主义者仅仅站在实证科学的维度上衡量理想的话，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理想与现实是隔断的。关于这一点，日本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1876-1940）在1907年做出了这样的概括：“如果从现实抽象出某种东西作为标准，成为概念，成为理想，就不是现实，而是远离现实的东西”。其二、理想妨碍人们对生活现实、真实的把握。在长谷川天溪看来，对于人类而言，“宗教、道德、人生、文艺问题，在哪个时代也不会消失，由此产生出了战争、争论、烦恼、自杀者，这些皆缘于理想的五彩的光华的迷惑”，所以理想“只不过就是假说的游戏的结果，与这个现实的世界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基于以上两点看法，自然主义者认为，要真正全面探究、解释“切实的人生的诸问题”，“首先就必须将这些作为理想的东西视为乌狗。而在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的立脚点，确是必须达到破弃理想的境地，即破理显实，这正是这种主义的要谛”，³³⁾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探索人生的目的和终极理想都是没有必要且毫无意义的，主张放弃对一切理性、道德、宗教和人生的探求，放弃对一切目的和理想的探求，³⁴⁾对此，田山花袋（1871-1930）在1908年做出的“自然派是无目的无理想的”³⁵⁾的断语可以作为恰当的总结。³⁶⁾而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从实证科学立场出发的偶像破坏活动，更是对理想性的精神诉求，从传统的宗教信仰、习俗到现实改造的理想、信念等，一概加以破除与否定。

那么自然主义者们又是如何看待人的本质的真实内涵，以及人的社会生存的真实状况的呢？

32) 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P212-213页。

33) 长谷川天溪，《排除假说的游戏—论自然主义的立脚点》（「论理的游戏を排す：所谓自然主义的立脚地を论ず」），《太阳》杂志，1907年10月。文章主旨是把人类一切关于人生的理想都视为假说，要求排斥理想的假说，忠于现实。日本自然主义1906年发生，1907年自然主义论大盛，长谷川天溪是最主要的理论代表之一。

34) 叶渭渠，《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述评》，见《自然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初版，P274-275页。

35) (日) 田山花袋，《自然主义的前途》（「自然主义の前途」），《新潮》杂志，1908年3月。

36) 以上分析部分参考叶渭渠所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述评》。

自然主义者们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完全建立在当时生物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及假设（如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认为真实的人的本质仅限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当中，完全否定人的超越性精神，正如升曙梦所概括的那样，“自然主义……观察人，只从生物的一面，对于心灵、精神的一面全不顾到”³⁷⁾。由此他们对于人的生活描写主要注重于纯粹生物性的一面，特别是对隐蔽、黑暗的部分，尤以对于性欲的描写最为突出。当这种认识发展到极端时，他们便“只看见人间的兽性”³⁸⁾了，并把这些“兽性”的真实方面视为人生的全部。

对于人生的真实状况，自然派作家有着较为集中的表达。他们本着求真的态度去如实描写，对此问题一般不会做出明确判断，但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生却显示出了共通的情状。对此日本文艺评论家相马御风（1883-1950）进行过分析：

通观许多作家底作品，也可以看出“时代的特色”这共通点来。其一，十九世纪后半的作家有一共通的特色，即肉迫理想与现实底矛盾和冲突，而描写其真相。在现实与理想底战争中，大多是现实占胜利的：这一点也是许多作家相同通的。福祿贝尔……莫泊桑……屠盖涅夫……安特来夫（Andreeff 1871-1919）……达龙道（D'Annunzio 1863-）……霍特曼……斯特林堡（Strindberg 1849-1912）底作品，—都是描写这一点的。（着重号为译著中原有—论者注）³⁹⁾

求真意志使得自然派作家勇于抓住并直接“肉迫”社会与人生最尖锐的问题，相马御风正揭示出了最为自然派作家关注，也最令其精神饱受煎熬的一个“共通”的思考命题，即人的强烈求生意志或扩展自身生存的愿望同现实之间的剧烈冲撞，也就是“理想与现实底矛盾和冲突”，这正是当时人们所普遍面对的一种生存困境，它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造成了人们巨大的身心痛苦。对此，自然派作家力图“描写其真相”，但当着手描绘所观察到的那部分真相时，每个作家笔下所表现出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局，却大抵相同，几乎皆为“现实占胜利”，人被现实或被所谓的自然法则（比如遗传等）等压倒。

（不过这里只是表现，没有价值判断，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这样坚持的）。

37) 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P106页。

38)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期。

39) 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P119页。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由于“作为自然派的作家，专依自己的直接经验，因为只是想忠实的描写眼前的现象或生活，势必不能描写以往那样的人生普遍的类型Type，要写眼前所见的个体Individual，因而要十分显著地表现那个事物的个性⁴⁰⁾”，所以在大多数作家作品中虽然都表现出了相近的现实状况，但这仍只是每个作家个人的观察与表现，不能看作是作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新理想主义者看来，正是自然主义的这些观念倾向，及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对于实证科学时代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正如前文所述，自然主义者只是按照科学观念的要求，对自己的亲身观察作忠实的描述，并未想对人生做出消极的判断，更未曾预料到会对社会人群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这种严重的负面影响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

据上文的分析，自然派作家虽然只是不带任何判断地据实描写社会现实，但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生却显现出了共通的情状，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自然派作家对人生价值带有一种暗示的判断的错觉。如相马御风就发现，大多数自然派作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描写，基本都展现为人被现实或自然法则等所压倒。虽然每个作家都是按照自己的观察体验就实描写，但由于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这样的共同内容，而且他们所选择的题材又大都集中于人生的黑暗面，再加上表现时的“冷酷的态度”⁴¹⁾，这似乎就已暗示出自然派作家对于人生真实状况具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如此必然会深刻影响社会人群对现实的认识把握，其结果，社会人群便极易把这些共通的描写视为现实人生的普遍状况——人生的全部真实，并接受从这些据实描写中看到的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终极”价值判断。继而唯物时代中原已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决定论 (Determinism)”⁴²⁾也被他们极端化，于是就变成了“机械的运命观”，这就是相马御风所说的“现实描写所暗示的人生底意义，到了极端，便成了机械的运命观”⁴³⁾，周作人称之为“极端之决定论”⁴⁴⁾。

这种“机械的运命观”原本就已揭示出了人在世界上所处的悲惨地位，而自然主义者

40) (日) 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下卷》，罗迪先译述，学术研究会总会发行，1929年1月3版，P50页。这一部分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依原文略加修正，参见《厨川白村全集》第一卷，改造社，1929年版，P285页。

41)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42)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近代欧洲文学史》中称“唯物之决定论”，219页。

43) 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P119页。

44)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242页。

们对现实问题“无解决”、“无主张”的态度，以及直接否定理想的真实性与存在意义的观念，对人们已非常脆弱的心理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向人们昭示出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景况：人在社会、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都将难以挣脱其悲惨的境遇。首先，人们从自然主义者们的观念中看到，人提不出任何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案，一切力图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主义也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幻想、空论而已；更严重的是，“机械的命运观”把科学作为它的稳固基石，令人感到根本无法违拗。其次，作为对浪漫主义时代思潮的反动，自然主义者否定一切超越性的精神诉求，当这种认识发展到极端时，他们便直接将人仅视为“兽性”的集合，按照后来新主观主义的说法，他们抹煞了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精神/“灵”的意义，甚至连想象力也加以了否定⁴⁵⁾。同时，决定论观念也彻底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周作人说，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⁴⁶⁾。如此，对于这一时代的人们而言，最终连“精神上的超越”、自由意志的抗争的唯一逃路也被彻底阻断了。

在这种境况下，无形中人就被自然法则的铁笼牢牢枷住，只能服从于它的支配，正所谓“人类精神力底无用与自然的命运之绝对的君临”；同时人的生活完全处于无比黑暗的状态下，其间所有的都是“丑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邪恶的东西、黑暗的东西”。这样人生就被蒙上了一层惨雾，人们心中充满了“人类怎么样苦闷，也不能战胜自然的运命的这种痛苦的绝望”，对人生完全悲观绝望，甚至产生了“黑暗的厌世的心情”。⁴⁷⁾

这一走向“怀疑绝望”⁴⁸⁾的心理历程，周作人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中也曾做出过分析：“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应用于人生观，乃成决定论 (Determinism) ……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盖天性与外缘，实为一生主宰，联结造因，以至归宿。此唯物之人生观，实即自然派文学之主旨，神既非真，无以尊于人，人又不异于物。现实暴露之悲哀，引人入于悲观”，而这种绝望悲观的程度极为深重，“较之历世人生厌倦 (Tedium Vitae) 自尤为深切”⁴⁹⁾。

应该说，这个时代原本已给人们压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自然派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使人们给自己的精神加上了异常沉重的枷锁，以至很难再从其中挣脱出来。

45) 叶渭渠，《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述评》，见《自然主义》，P275页。

46)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211页。

47) 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P119-120页。

48)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236页。

49)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211-212页。

2、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精神本质的理论思考

虽然当时的思想家们并未曾预料到自然主义观念倾向会对人们的精神造成如此深重的负面影响，但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文化偏至”的必然后果，这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实证科学时代观念的迅速衰微。十九世纪后期，在西方世界发出了反自然主义的呼声，其中新理想主义者的反动，主要集中于上节所述的自然主义的主要观念倾向、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以及“机械的命运观”、绝望的人生观念几个方面，他们在对此进行积极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各成体系的新理想主义观。不过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实证科学时代观念的偏颇与极端的方面，对其积极的方面仍然大加肯定，并极力吸纳：如对科学本身及19世纪科学成就的信任（但反对实证科学时代的唯科学主义）；对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求人生之真的态度的推重（但要求更全面的人生）—即他们敢于大胆地直面现实，掀起一切的掩盖，并且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做出深入广泛的探查，力图认识人生的全面、世界的全景；尤其将自然主义大刀阔斧地破坏既成的宗教、道德、教育及其它偶像的旧物破坏、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实践⁵⁰⁾视为楷模。总之，新理想主义观念的形成，承继了实证科学时代积极的探险精神，并在此精神探险成果之上有了新的发展。关于这种联系，升曙梦曾引述某评论家的论断加以说明：

并不是说因为自然主义到了末路了，我们再从原来的地方来出发。是从到末路的这一点来出发的。我们并不想还到原来的地方去，由自然主义来打开了眼睛，不会无理地塞没的。回顾那由自然主义底凄惨的努力而通过了的险路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把由它赢得了的东西来瞎弄的。不要忘记：我们底理想主义，是通过了自然主义之后的理想主义。越是Realistic，便越是Idealistic……⁵¹⁾

升曙梦也赞同新理想主义是“从充实的批评的精神，向着新的理想底目标，继续勇猛精进的努力”⁵²⁾的观点，所谓“继续”，就是指新理想主义的活动是对上一时代积极探索活动的继续。总之，新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时代观念的关系，一方面是新理想主义反抗

50)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P7-9页。

51) 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P296-297页。

52) 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P296页。

后者对人生观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新理想主义对自然主义时代求真的探险精神及其积极成果加以肯定，并使之成为自身重要的思想根基，升曙梦的所谓“新理想主义之所以成为新理想主义，在于通过了自然主义底幻灭时代这一点⁵³⁾”的观点，正是基于对二者关系的这一认识而做出的论断。

周作人对于上述新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时代观念间关系的认知，是相当认同的，除了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谈到外，在《〈诱惑〉〈黄昏〉译者附记》、《〈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中也都有精到的论断，同时周作人在这些文章中还表达了对新理想主义共通精神内涵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周作人选取这些小说本来就是有意而为之的，当然最主要的原由还是为了思想的介绍、宣传，对此他在五四前后曾多次说明。关于周作人对这种共通的精神内涵的认识，论者将以《〈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为主，并结合其它几篇作品加以分析。

1919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为南非女作家Oliver Schreiner的“比喻(Allegoria)体”小说⁵⁴⁾《沙漠间的三个梦 (Mimosa树下所见)》所作的译者附记中谈到：

现代文人对于人生，又多带乐观的倾向，在文艺上，理想主义渐占了势力。Schreiner夫人对于女子问题，回顾过去，近看现在，自然多是黑暗；但远望将来，却抱着无限光明的希望：所以伊的著作的基调，与消极的自然派便自不同。伊一样的根据现实，但并不就此完结；却更以理想，寻求圆满的解决。这积极进行的态度，与古来空想家的梦幻，又有分别；所以这篇比喻，虽说是《天路历程》一流，却更加真实。因为写人间生活的历程，在现代人了，自然觉得尤其深切……⁵⁵⁾

这段评介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新理想主义是如何由反对自然主义而生成了自身的精神特质的。

首先，新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实证科学时代严格的历史与现实批判精神的同时，也

53) 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P297页。

54) 周作人在《〈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中将这篇小说视为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流的“比喻(Allegoria)体”小说。

55) 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此文及其他译者附记在《新青年》中登载时，文字或标点上出现的不确切之处，论者皆在引文中略加修正、调整，对此不再一一标注。

繼承了自然主義思想家們對於歷史與現實狀況的基本認識。對於現實，經受了實證科學時代洗禮的新理想主義者們，不僅全面肯定了前一時期的科學成就及觀念，而且接受了基於這些科學“常識”之上的對現實人生、世界的認知，他們認為這是對於現實的科學的真實認識，正是基於這一原因，當時有很多史家稱自然主義者看清了現實的真相。同時新理想主義者們也肯定了自然主義者們對於歷史的基本認知。自然主義者們加入到偶像破壞的思想運動中，以科學為指歸進行歷史批判與研究，因此被他們所揭示出的歷史，往往是在以前被意識形態或傳統觀念的歷史“神話”所遮蔽的黑暗的歷史，他們認為這才是歷史的真相，這種認識被新理想主義者們所贊同。周作人正是在《〈沙漠間的三個夢〉譯者附記》中，明確指出了新理想主義者們在對歷史、現實的認知問題上與自然主義者相一致，“Schreiner夫人對於女子問題，回顧過去，近看現在，自然多是黑暗”、“伊一樣的根據現實”（這是在與自然派比較時說的），說明了新理想主義者們同自然主義者們一樣看清了黑暗的歷史，也看到了現實的真相。應該說，這一認同，正是新理想主義者們對歷史、現實問題進一步思考的真正起點，在此基礎上，他們才做出了新的開拓與發展。

其次，在周作人看來，雖然新理想主義者們接受了自然主義者們對現實、歷史的認識與判斷，但如何對待這種現實，新理想主義者們與自然主義者們，以及自然主義時代的普通大眾相比，則有著本質性的差異。一方面，新理想主義者們既與“消極的自然派”不同，不會像他們那樣對現實、人的生活的黑暗不作任何價值的判斷，也不同于前一時期的普通大眾，對現實、歷史完全絕望、消極。周作人在談到契訶夫的人生态度時，與自然派做了明確比較，“唯契訶夫雖悲觀現世、而於未來猶懷希望、非如自然派之人生觀、以決定論為本也”⁵⁶⁾，在論及庫普林的人生态度時，也談到“Kuprin思想，頗近樂觀；以為現世惡濁，而將來非無光明之希望”⁵⁷⁾。總之，在他看來，新理想主義者們不僅“肯定人生”⁵⁸⁾、“多帶樂觀的傾向”，而且“遠望將來，却抱著無限光明的希望”。周作人在《〈瑪加爾的夢〉譯者附記》中所引述的英國人斐爾（Marian Fell）對科羅連珂的評斷，對新理想主義者們的這一特質也有較為全面準確的表述⁵⁹⁾。另一方面，自然主義者們在看清現實後，只是把現實中的黑暗、矛盾、不義等照原樣地表現出來，却並不尋求

56) 周作人、魯迅，《域外小說集·著者事略》。契訶夫的〈威施〉、〈塞外〉是由周作人翻譯，因此契訶夫的著者事略應為他所做。

57) 周作人，《〈皇帝之公園〉譯者附記》，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號。

5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59) 周作人，《〈瑪加爾的夢〉譯者附記》。

解决之道，“就此完结”，因为对他们而言，“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⁶⁰⁾。新理想主义者则与之相反，他们“一样的根据现实，但并不就此完结”，而是持一种“积极进行的态度”，具体而言，即周作人所说的，“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⁶¹⁾，这里所谓的“改造生活”，绝不单单是停留于发出社会改造吁求的阶段，而是要求直接投入到积极的社会改造实践当中去，而且，在理想的朗照下，这种改造活动也必然会表现出对于理想终极目标的诉求，即“以理想，寻求圆满的解决”。

第三，在周作人看来，新理想主义者们“寻求圆满的解决”的“积极进行的态度”，与以往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他将后者对圆满解决的寻求称之为“空想家的梦幻”，言下之意，新理想主义者们寻求圆满解决的积极进行的态度具有坚实的现实性。究其原因，在于新理想主义者们经过了实证科学时代的洗礼，因此一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他们敢于大胆地直面现实，掀起一切的掩盖，并且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做出深入广泛的探查，力图认识人生的全面、世界的全景，对此在周作人所译霭理斯的《左拉论》中有所揭示⁶²⁾；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拥有科学的眼光及认识工具，因此比以前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们，更能全面地看清现实，并说明现实的真相，所以周作人称他们“写人间生活的历程，在现代人看了，自然觉得尤其深切”。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在周作人看来，新理想主义者们寻求积极解决，并要付诸行动（即“进行”）的态度，是站在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之上的，显现出了“新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新理想主义”时代的特征。因此，新理想主义者们“远望将来”所怀抱着的“无限光明的希望”，改造社会、最终要实现“圆满的解决”的理想，以及要将这些付诸实施的“积极进行的态度”，也就绝对不是空想，是基于对现实的真实判断而做出的，具有完全的现实性；而且更进一步，周作人翻译了《沙漠间的三个梦》，这篇小说以比喻的方式解说了“人间生活的历程”，即全人类从被奴役状态到将来完全自由解放、建成地上天国的艰难迈进的历程，正是通过翻译、介绍这篇小说，充分表达了周作人对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并建成地上天国的理想的坚信。

60)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61)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62) (英) 霭理斯，《左拉论》(Zola) 原载1898年出版的 *Affirmations*, P.131-157, 由周作人译出，收入《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第1版。

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周作人必然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新理想主义者在理想朗照之下的社会改造活动，一定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真实认知基础上的，并必将得到“圆满的解决”。而我们说，这种社会彻底改造的实现正是新理想主义最终要完成的目标。关于新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宫岛新三郎曾在《现代欧洲文艺思潮》中从近代思潮发展的角度做过阐释，他指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步入了社会改造期，同时“社会意识”也取代19世纪盛行的“个人意识”，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新理想主义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并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思潮运动，因此社会改造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理想主义的中心任务。⁶³⁾

除以上谈到的三点外，周作人还在另两篇的译者附记中论述了他所理解的新理想主义的一些其它特质。在《〈诱惑〉〈黄昏〉译者附记》中，他谈到了自然派与新理想主义者的某些关键性差异：

《诱惑》这一篇的意思，同法国Maupassant(通译莫泊桑—论者注)的《月夜》(见《域外小说集》卷二)大略相似。但Maupassant是唯物论者，他所承认的爱的力，自然也只是物质的一面。《诱惑》的作者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家，所以他的爱的赞美，是真诚的，也是健全的，这是根本上的不同了⁶⁴⁾。

在他看来，自然派对人生、人的精神活动完全是从物质的角度加以分析解释的，否定了超越物质之外的精神的存在；而与之完全相反，新理想主义则充分肯定精神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精神的超越性与独立性。对此，周作人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新理想主义者的看法是“健全”的。

与此同时，周作人也强调了新理想主义者对于整个人的生活的理解，超越了自然主义时代对人生只作唯物质理解的偏颇，是一种健全的人生观。这一认识对于周作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63) 参照宫岛新三郎所著《现代欧洲文艺思潮》第五章《改造期的文艺思潮》，P133-177页。

64) 周作人，《〈诱惑〉〈黄昏〉译者附记》。对莫泊桑小说《月夜》的此等分析，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杂识》中早已谈及，即《月夜》一篇，可仿佛见摩波商著作大意，此言灵肉之冲突，而人欲终为世主者也，相其外貌，与常人言爱之神圣颇近，第返检作者行状，则殊异可见矣”。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就是1921年《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中所说的“根柢实不同”。

1920年8月27日周作人完成了《〈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其中全文引用了英国人斐尔 (Marian Fell) 对科罗连珂的评论 (写于1916年)，他解释是因为这篇文章“说的很明白”，实际上在这里周作人是想借这篇简短的思想评传，作为个案来具体展示新理想主义者的生活历程、基本观念，及改造社会的实践。菲尔在文章最后总括了科罗连珂的思想，即他的新理想主义观中对理想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大多数新理想主义者的普遍认识。菲尔这样概括道：

但是无论庄重或愉快，喜悦或悲哀，科罗连珂在他对于世界的观察上，总是一个乐天家。即使经了艰难忧愁不幸，他小说中的穷苦质朴的英雄都回头向着光明。著者的亲切的心不绝的在那里寻求各人里面的“永久的人性”。他很深的表同情于人类的不可遏的求自由与公道的愿望，因为有这个，才能无畏的与“恶”相对面。他自己在一封信里，曾对朋友说：“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实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它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了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就是说向着和爱，真理，正直，与公道。”

这便是科罗连珂的装在他一切著作里，对于世界的使命与主旨。⁶⁵⁾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到，科罗连珂在深刻地了解了生活的黑暗后仍对世界、人生抱有乐观的态度，这是有理想的坚信作为支撑的，而且他确信这理想符合宇宙间的“定律”，这一定律带领我们向“善”——即爱，真理，正直，与公道等一切人生、社会的理想而进。为了突出这是真理性质的“定律”，科罗连珂作了个很有趣的解释，即把实证科学时代的决定论等都重新进行了新理想主义化的解读，使之变成为新理想主义理想观念的一部分：“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势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它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了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

以上所分析的几点便是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共通精神内涵的基本认识。

3、周作人与新理想主义世界改造思潮

65) 周作人，《〈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这是英国人斐尔 (Marian Fell) 1916年所作评论中的说法，周作人说这篇文章“说的很明白，所以便将他全译了。”

“一战”后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改造热潮当中，新理想主义从一种观念领域的思潮转变为一种社会改造的思潮运动，而且全世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新理想主义的色彩，新理想主义到了它最为辉煌、鼎盛的时期，真正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观念。⁶⁶⁾

而周作人作为新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表，正是在这一时期，对于新理想主义不仅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思考，而且积极投身于新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洪流中，在中国极力推进新理想主义的宣传与社会改造实践。当然，他所介绍的新理想主义，主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形态。对于新理想主义与现代人道主义间的这种隶属关系，20世纪初的众多史家、思想家，基本都是认同的。⁶⁷⁾

当然，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世界改造思潮运动的积极投入，是与他时代的总判断分不开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对新理想主义充分肯定并加以宣传的史家、思想家们，虽然对新理想主义的内涵、范围的认识有着一定的差距，但对其与时代的关系，却有着共同的认识：他们认为新理想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20世纪初最新的社会、精神现象，它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前景与希望，在他们看来，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现在的各种倾向都在向着新理想主义的大路迈进，这是一个新理想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认识下，他们都表示愿意积极投身这一人类精神、人类历史的盛典，为新理想主义社会改造最终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并积极从新理想主义观念出发，对人类历史、现实社会做出严正的评断，同时对未来做出展望。⁶⁸⁾应该说，这些认识在周作人那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前文所述，周作人在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从史论的角度暗示出了时代的特征，表明新理想主义不只是当时日本的情形，也不仅是文学发展中的特点，而是整个世界思潮的状况，并代表着世界的新走向。而在《人的文学》及有关新村的诸篇文章中，他则充分阐明了自己对世界、中国发展前景的总的判断，并表达了对整个世界及文明必然走向的坚信，同时他也表达了肯定人生的态度以及根本性地改造

66) 请参照拙文《20世纪初世界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五四”人道主义思潮背景探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3期。

67) 参照以下所列著作。重要译著包括：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着重论及新理想主义的论著主要有：孙席珍，《近代文艺思潮》；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吴云，《近代文学ABC》；黄忏华编述，《近代文学思潮》。

68) 同上。

人生和社会的愿望，并阐述了自己的人学观念。

周作人在五四前期的思想观念，及其对时代做出的判断与对未来的展望，皆为新理想主义中的现代人道主义基本信念的显现。对此如果参照他在1920年4月17日所作的〈点滴·序〉，便可清楚地了解。此文是他对五四前期翻译工作的一个总结，其中概括了所译作品的思想倾向，即共同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这也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的明确表达⁶⁹⁾：

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⁷⁰⁾

上述论断明显就是对新理想主义中的现代人道主义的相对完整定义，而他所介绍的这些人道主义作家，大多被当时的西方文学史家、批评家归入新理想主义者行列，或被视为在某些观念上与新理想主义极为接近，如梭罗古勃、库普林、斯忒林培格、托尔斯泰等。

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讲的那样，这些具有共同精神的作家们的人道主义观念倾向各不相同，而他的人道主义观念与社会改造实践也有着自己的偏向，他比较认同日本白桦派成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不过与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仍有所不同。周作人将中心置于对人的问题的全面思考之上，重点探讨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包括“人”的和谐与“人间”的和谐）的问题，对此他不仅做出了全面的思考与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从社会实践的层面也提出了全面解决人类现存问题的方案。不过此点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

69) 周作人在1920年4月17日所作〈点滴·序〉中谈到，“这一册里所收的二十一篇小说，都是近两年中——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翻译”，见《点滴》，周作人辑译，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8月第1版。

70) 周作人，〈点滴·序〉。

<Abstract>

On Zhou Zuoren's ideas of the Neo-idealism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May 4th

Zhang Xian-fei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 " the Neo-idealism had transformed one kind of worldly ideological trend of society transforms, had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in China. Zhou Zuoren introduced the Neo-idealism into China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May 4th, thought deeply, at the same time, did one's utmost to advance the practice of society transforms of the Neo-idealism. The article combs how the Neo-idealism be introduced into the modern Chinese emphatically, and probes into Zhou Zuoren's ideas of the Neo-idealism.

Key Words Zhou Zuoren Neo-idealism Naturalism Modern humanitarianism

투 고 일 : 2007년 11월 25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2일
--